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SHI JIE MING REN GU SHI CONG SHU

韩愈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团结出版社

26.108
HY
C-4

2-10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主编：许庆龙 劳 斌

韩

愈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责任编辑:吴章胜

封面设计:李 泽

插 图:许 艳

世界名人故事丛书

许庆龙 劳 斌 主编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店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信宜市人民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450印张 9000千字

1996年9月第1版 1996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7—80130—077—7/K·42

全套(108册)总定价:486.00元

前 言

在当今经济社会中，经济大潮滚滚向前，伴随经济潮流而来的各种意识潮流也扑面而来，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现象常有发生。“关心下一代，培育下一代”是我们当之无愧的匹夫之责。

针对青少年求知欲强，鉴赏力差的心理特点，我们特别推出了这套健康、严肃、高雅的《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以引导青少年在人生道路上端正思想，少走弯路，争做二十一世纪标兵人才。

读者皆知各种各样的名人传记自改革开放以来，如雨后春笋，星罗密布。文艺创作者们各显神通，百花齐放，从各个角度，各个层次对各种“名人”进行了纵横捭阖的记录。我们编辑出版这套《世界名人故事》丛书不仅支持了当今倡导的高雅文化艺术，而且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奉献了一朵小花。

通过名人光怪陆离、五光十色、丰富多姿的人生经历的描述，从而使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名人们的坎坷经历、奋斗成长的历史中得到启迪、受到激

励；另一方面还可以从他们的人格品质，理论思想中汲取有益的人生经验，使自己的思想得到陶冶和升华。针对以往的名人传记故事，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绝对化程式，该套丛书作了大量努力，争取做到实事求是，反对“一棒子打死和全黑全白”的绝对化做法，不受条框限制，采取“老灶爷上天——有啥说啥”的方针。

由于世界名人千千万万，“名人”标准各不一致，在选材中，我们也没有受“条框”限制，尽量从各个领域、各类人物中选其一、二。然有许多代表性的人物由于参考资料等欠缺，我们没能选入。

编辑该套丛书的作者，尽量做到了广泛参阅同仁们的有关名人传记的研究成果，为省篇幅，引文和参阅书目一律未加注释，还望同仁们赐教海涵，同时我们也表示对同仁们衷心的感谢。

编 委

一九九六年一月

目 录

韩愈简历	(1)
一、韩愈的生平	(8)
二、韩愈的散文	(61)
三、韩的诗	(97)

韩愈简历

唐宋时期，以散文名世的有著名的“唐宋八大家”，韩愈以其在古文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和出色的创作实践，排名八大家之首。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对中国文学史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古文运动是一种文体革新运动。文体革新运动早在韩愈之前就曾有过。西魏文帝时代宇文泰与苏绰等所倡导的文体改革运动，就是一次散文与骈文的较量。《周书·苏绰传》记载，宇文泰对晋代以后形成的浮华文风深为不满，想革除这种弊端。一次魏文帝借祭庙机会，命令苏绰作诰文，苏绰使用了散文句式，在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此外，从初唐的陈子昂到天宝的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等人都曾提倡散文，反对华而不实的骈文。但是，韩愈之前的散文运动，成就都不是很高，对扭转文风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总之是没有取得大局的胜利。

而韩愈领导的古文运动，不但在当时取得了取代骈文的伟大胜利，而且奠定了散文在文学史上长期的统治地位。这一古文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五四”新文化运动。

可见，韩愈的名字是和唐代的古文运动紧紧联系一起的。

韩愈，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旧唐书》称韩愈是“昌黎人”，韩愈自己在文章中也常称昌黎韩愈。照朱熹的解释，韩愈这样自称，只是好称郡望的惯例，可能和“言刘悉出彭城，言李悉出陇西”一样。韩愈出身于官宦世家。他三岁时，父亲韩仲卿就去世了，由其堂兄、朝廷的重臣韩会抚养成人。他的思想深受韩会的影响，所以其政治立场倾向于大地主阶层。韩愈早年科举、仕途不顺。德宗贞元二年（786），他离开宣城住处，进京应举求官。八年后才登进士第，但接着连续两次的举科考试都失利了，以前进士身份三次向赵憬、贾耽、卢迈等宰相上书又得不到采纳，只好郁郁东归。贞元十九年（803），任监察御史时，关中旱灾，他上书请求宽减税钱，被幸臣所谗，贬为阳山令。唐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因在平定淮西藩镇吴元济的战争中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918），又因为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穆宗即位（821），召回京都，任国子祭酒。后转为兵部侍郎。长度二年（822），任吏部侍郎。

韩愈提倡古文运动，开始于唐德宗贞元（785—805）前期。起初，只有李翱、张籍等少数朋友拥护，后来参加和拥护的人越来越多。到贞元末年的时候，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唐宪宗元和（805—820）以后，由于柳宗元的加盟，古文的影响更大了。到唐穆宗长庆（821—824）末，也就是韩愈去世的时候，古文已经取得了文坛的统治地位。

古文运动在韩愈时代推向高潮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他在长期的仕途进退中不断地总结前人的成果而发展起来的，理论上越来越成熟，创作上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韩愈的古文理论是在创作实践中逐步提出来的。韩愈论文，往往和“道”结合在一起，他强调文和道的统一（《文书自传道》）。他说：“愈之所

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又说：“思古人而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明确强调文道关系，是贯穿在韩愈文学主张中的重要思想，这种思想是他在早年提出来的。其次，韩愈是提倡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要有所革新的，并非简单地全盘接受，而且继承的应该是古代圣贤的思想，而不是表面文章，即所谓的“师其意不师其辞”。至于“辞”，不是不讲究，而是有当时的标准，就是说，这个标准不是取自古代。在这一点上，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主张：“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孔子讲究“文”（词藻）“质”（思想内容）的比例关系，认为理想状态是“文质彬彬”（文质各占一半）。孔子也说“辞达而已”，即语言可以正确表达思想就可以了。韩愈去陈言的主张在精神上与孔子是相通的，但他更加有针对性，他针对当时过分讲究词藻和声律而忽视思想内容的骈文，因此，在当时是有震聋发聩的意义的。主张去陈言的同时，韩愈也主张作家在语言上要创新。他根据自身的体验，认为语言表达决定于作家的精神力量，即“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获得气的途径是“行乎仁义之途，游乎《诗》、《书》之原。”语言创新不能走极端，否则，造语怪僻，就反而不能传道了。大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后来又提出了语言规范的标准，在《南阳樊绍述墓铭》一文中提出另一著名的古文形式的观点：“文从字顺各识职”。其实，“唯陈言之务去”与“文从字顺各识职”两句话合起来就是韩愈古文运动的语言观的全面表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用自己的创造词汇、正确流畅的语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可见，韩愈师古而不泥古，创新而非生造；不管师古还是创新都不过是为了准确地表达合乎“道”

的思想。在《答刘正夫书》一文中，这种主张被表达得淋漓尽致：

或问“为文宜何师”？必谨对曰：“宜师古圣贤人。”曰：“古圣贤人所为书具存，辞皆不同，宜何师？”必谨对曰：“师其意，不师其辞。”又问曰：“文宜易宜唯？”必谨对曰：“无难易，唯其中尔。”

韩愈还认为，要写文章的原因是作家内心有不平之气。在《送孟东野序》一文中，提出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论点。对韩愈的这一论点，如果一般地理解为创作要有感而发，作为一种创作原则，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跟韩愈反对浮华文风也是相一致的。有人把韩愈的这一观点，人为地拔高了，说他指的是对现实环境的不平，并认为他这一观点突破了他自己所圈画的道统的束缚。这是不符合事实的。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高，决不是因为他的作品揭露了什么深刻的社会现实。从他的自我表达以及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方面来说，韩愈的现实性和人民性都是很弱的，不超出一般封建文人的樊篱。虽然他自己高自期许，说自己“有忧天下之心”，不安于山林，做一个“独善自养”之士（《上宰相第三书》）。他说他的人生追求，“其小得，盖欲以具裘葛，养穷孤；其大得，益欲以同吾之所乐于人耳。”（《答崔立之书》）这不过是一般封建文人都说的大话。实际上，韩愈的不平之气，郁郁寡欢，不过是因为王公大臣们不了解他，重用他。所以他曾以僵在池滨江的怪物自比（《应科目时与人书》），以不遇伯乐的千里马自比（《杂说》，又《骅骝》诗），以不待圣人而出的不祥之麟自比（《获麟解》）。如果再结合他一些恭维权贵的文章，我们不难看出，韩愈的思想，境界并不高。实际上，他的大半生都在戚戚于贫贱，

汲汲于富贵。

现在来谈谈韩愈的思想。

先说政治思想。政治上，韩愈也曾做过一些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事情。例如，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封建最高统治者尊崇佛教，任袁州刺史时还废掉了男女隶人的弊俗；等等。但总的来说，他是反对在当时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具有进步意义的势力的，而极力维护旧的落后的代表大地主、大军阀阶层利益的势力的。在文学上，韩愈是柳宗元的朋友，但在政治上却是对立面。他对柳宗元所在的政治集团王叔文集团的进步主张是持否定态度的。

韩愈思想中的主要部分是儒学思想。韩愈年轻的时候就有道统自任的思想，他在二十六岁时说过这样的话：“斯道未丧，天命不欺，岂遂殆哉，岂遂殆哉。”（《上考功崔虞部书》）在这方面，韩愈是相当自信的，他曾说过“若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大话（《答吕医山人书》）。应该指出，韩愈的儒学思想并不一味地排斥其他各家思想，例如他对墨子的一些思想就是采取吸收的态度的，他也曾经努力调和先秦百家之学。

在行为上，韩愈有一点独特之处也值得一提：宣扬一种新的师生关系。孟子曾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以孟子继承人自居的韩愈却在早年即抗颜而为人师，以至得狂名。在《师说》一文里，他对那些反对他公然为人师的诽谤作了严正的驳斥。他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等主张，确立起一种全新的师生观念。这种积极的主张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它为韩愈网罗人才推动古文运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从今天看来，韩愈的儒学思想、政治提高基本上是不足

观的。使韩愈不朽的主要是他的文学主张和成就。他一生政治和文学活动的复杂面貌，决定了他的巨大成就和不可克服的局限。关于古文运动，上文已有介绍，下边再说一说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

为了文学技巧，韩愈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进学解》）。韩愈学习文学创作是一个艰苦而又曲折的过程。在《答李诒书》一文中，他叙说了自己二十余年的学文经历，开始的时候只读三代两汉的书，只存圣人的志向，居家走路都神思恍惚。心里有所得而想写作时，只想着摒弃陈词滥调，于是很难下笔。看人的时候，别人的非笑也看不出来。这样过了几年，情况仍然差不多，但慢慢地能辨别古书的正伪，渐渐地文思顺畅，想写作时也能水到渠成。对于别人的喜怒哀乐也能作出相应的反应。这样又过了几年，文思就如泉涌了，但这时又害怕杂乱。于是，进行选择淘汰，加工提炼，终于达到纵横恣肆而不出差错的境界。

正是有了这种不懈的追求，韩愈的古文才取得了卓绝的成绩。韩愈纯理论性或文艺性的篇幅虽然不多，但他出于实用目的而写作的书启、赠序、碑志、表状等文字，大多杂用古文，写得不落俗套，体现了很高的文学技巧。例如，《师说》、《杂说》、《送董邵南游河北序》等等就都是很隽永的篇章。

在韩愈的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些生动的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例如，作于元和二年的《张中丞传后叙》一文，刻划了抗击安史叛军的战将形象，写得错落有致，前呼后应。其中的许远，是一位宽厚长者；而张巡则是文武兼备并且从容就义的不屈不挠的英雄；对南齐云，不同于对张巡详写其逸事的

做法，而是着重写其乞师贺兰进明一事，具体地叙述细节场景，意在突出其“勇且壮”的特点。再比如《国子助教河东薛君墓志铭》，通过一场军中射箭比赛的具体描写，塑造出了一位能文能武、武艺非凡并且深于涵养的普通幕僚：

一军尽射莫能中。君执弓，腰二矢、指一矢以兴，揖其帅曰：“请以为公欢”。遂适射所，一座皆起随之。射三发，连三中，的坏不可复射。中，辄一军大呼以笑，连三大笑。

如果结合作文时的社会现实，可以理解韩愈塑造这一类英雄形象的用意所在。当时唐王朝在打击叛乱藩镇中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士气需要鼓舞。韩愈正好用其古文配合了形势特点。作者写作时以饱满、热情、明确的态度，恰到好处地完成了这一任务。真正做到“文章合为时而著”。

至于韩愈古文在语言上的一些特点，正是他古文运动主张的体现。他语言的总体特点是险拔。具体地说，又具有形象化、口语化等优点。由于韩愈注重语言的创新，所以创用了许多富有含义的词语，其中有不少还流传至今。今天我们常用的许多成语，如杂乱无章、不平则鸣、深居简出、痛定思痛、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垂头丧气、牢不可破、大放厥词、百孔千疮、一发千钧、一举成名、回狂澜于既倒，等等，就都来自韩愈散文。换个角度看，语言的影响也可以理解为文章的影响，作者的影响。而具有这种影响的文学家，历史上也是不多的。

一、韩愈的生平

少年时期

韩愈，字退之，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他原籍是孟州河阳(今河南孟县)，但是他的出生地，据现在掌握的资料，由于父兄官宦关系，一个可能是在江南上元(今南京市)，另一个可能是在洛阳(他把洛阳称为“旧籍”)。那个时代的人非常讲究“郡望”(在某一郡里人数多、官位高的大族，称为“郡望”，这是六朝门阀制度的遗习)，昌黎(今辽宁义县)姓韩的一族最为强盛，因此韩愈随着社会风气自称“昌黎韩愈”，大家便也顺着叫他“韩昌黎”，其实他不是昌黎人。

韩愈出生的时候，唐王朝度过了它的繁荣时期，正走着下坡路。天宝十四载(755)发生了安禄山、史思明领导的叛乱，它把唐王朝打得四分五裂，一蹶不振，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人民颠沛流离。安、史之乱在代宗宝应二年(763)结束，那是韩愈出生的前五年。结束仅是一个形式，叛乱散播的分裂种子却在生根发芽。安、史之乱的判将表面归顺朝廷，一个个成了称霸一方的节度使，父子兄弟相传，不听朝廷号令。他们互相厮杀，也跟朝廷捣乱。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藩镇之乱”，从

这时开始，一直延续到唐朝灭亡。因此大规模的战乱虽然停止了，形式却并不稳定。广大人民热切希望全国统一安定，忧国的人士也希望统治者励精图治，来一个声势赫赫的“中兴”。他们这种希望，也成了后来韩愈的希望。

韩愈的父亲韩仲卿，曾做潞州铜（今山西沁县）县尉（县令的副职），安、史之乱时调任武昌县令，据诗人李白所作的《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的记载，仲卿是一个能干贤明的官吏，在地方上很有功绩，当他调任鄱阳（在今江西）县令时，武昌当地父老为他“刻石颂德”。他死于代宗大历五年（770），最后的官职是秘书郎，管理宫廷的图书。仲卿除了和李白相识外，据说交游的朋友中还有诗人杜甫；并且编辑过三国魏的文学家曹植的文集。可见他对文学有相当的修养。仲卿共有四弟兄，他是大哥。二弟叫少卿，做过当涂（在今江苏）县丞。三弟叫云卿，是有名的文章家，擅写碑志墓铭，做过监察御史和礼部郎中。四弟叫绅卿，曾做扬州录事参军，又任泾阳（在今陕西三原东南）县令，不畏豪强，灌溉民田百万顷。这四个兄弟，都是有才能的人，但官职最多不出郎中、县令，除云卿官职较高外，其他三弟兄都职位低微，在当时算不上是“高门望族”。这决定他们的后代不能依靠家族的余荫轻易走上仕途，而必须经由自己的奋斗与努力，方才能够博取功名。

仲卿有三个儿子：长子韩会，次子韩介，最小的一个就是韩愈。韩介早死，韩会却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在永泰、大历年间，以他非凡的才学，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既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他写过一篇题作《文衡》的文章，宣扬儒家的道德教条，主张文章的教化作用。

这个家庭属于官僚地主阶级，但是显示了两个特点：

一，这个家庭没有什么很大的权势，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不高，在社会上处于中小地主阶层（一般也叫作庶族地主），出身这个阶层的人，遭受贵族大地主阶层（一般也叫作豪族地主）的压抑，对现实政治不满，具有一定的正义感和斗争性，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人民群众愿望，提出较为进步的政治主张。二，从仲卿、云卿到韩会，表明这是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家庭，韩会身上表现的儒学正统思想更是十分浓厚。这种家庭气氛有利于培养一个文学家或儒家学者的成长；但是浓重的儒家正统思想却又促成这个家庭的成员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诚卫士，使他们向大地主、大官僚阶层靠拢，因为后者和他们在封建剥削阶级的基本利益上终究是一致的。以上两个特点，对日后韩愈生活道路和政治态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

韩愈三岁就做了孤儿，由长兄韩会抚养。大历十二年（777），韩愈十岁的时候，厄运降临到他们的家庭。韩会受到政治斗争的牵累，远贬离开京师五千里的韶州（今广东韶关市西）。韩愈跟随兄嫂从长安南迁，这是一段漫长而艰辛的旅程：他们经过风涛壮阔的大江和一望无际的洞庭湖，又越过了连绵重叠的山岭，最后到达了韶州。

他们在韶州住了两年多的时间，韩会得病死了。他的死，打击了流寓在韶州的韩家：故乡离得那么远，一家之主的韩会死了，孤儿寡妇举目无亲，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们。幸得长嫂郑夫人排除困难，带领孤儿，跋涉山川，护送灵柩，回归故乡。后来韩愈把这一连串不幸的变故称为“天祸我家，降集百殃”（《祭郑夫人文》），又说：“昔余之既有知兮，诚坎坷而艰难！”（《复志赋》）但是投入在他家庭内的不幸的苦难，却也磨

砺了他的心志，鞭策他刻苦用功。因为不如此他就不能获得上进。他七岁开始读书，每天背诵几百字到几千字的文章，十三岁就学习写作。他后来告诉朋友，他少年时候怎样求书勤读：“仆少学好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答侯继书》）。他不论睡觉、饮食，很少离开书本；看得倦了，把书本当枕头；吃饭没有菜，就看书下饭。“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他成为当代最著名的渊博学者之一，完全是他勤读苦学的结果。

建中二年（781），唐王朝中央政府因为汴州（今河南开封）城区狭隘，加以扩充，引起了藩镇的猜疑。中央与藩镇的战争，看来一触即发，河南地区的人民骚然惊动，争相避难。准备在故乡河阳定居下来的韩愈一家，为了躲避这次战乱，不得不再度走上征途，避居到江南地区。他们在宣城（在今安徽）有一些产业，那还是韩愈的父兄在逃避安、史之乱时置办的，这一次又成了他们的避难所。

韩愈在宣城住到贞元二年（786），也就是他十九岁的那一年，方才离开这里到长安去参加进士科的考试。在他侨居宣城的五六年间，是他在学问的途径上摸索前进的时期。在所有的学习中，就象这个时代一切的有名作家一样，儒家的经典著作，是他主要的学习对象。唐朝统治阶级大力提倡“经术”和繁琐的“章句之学”（就是只注意经书上一章一句的解释，却不重视全书整体的意义），以此束缚人们的思想，巩固它的统治。在韩愈思想的形成期间，儒家的理论与观念正是如此地深入人心，文学家也高倡“必先道德，而后文学”，“立言必忠孝大伦”，这是韩愈的前辈，也是古文运动的前驱者梁肃（753——793，